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

访谈录



访谈

李慧波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主编

二辑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

访谈录

梁景和◎主编

第三辑

李慧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 第3辑/梁景和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56-1363-0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8586 号

ZHONGGUO XIANDANGDAI SHEHUI WENHUA FANGTANLU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 (第三辑)

梁景和 主编 李慧波 访谈

责任编辑 欧家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29 千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代序)

梁景和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大陆史学界所重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地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资料,然后再经过筛选和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口述史学对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本文是对口述史的一个初步的思考和实践体验。

一、关于口述史的回望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人类历史上,在撰写史书之前,就有从事过运用访谈和调查进行搜集史料的工作,在中国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依据大量的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在西方,如早期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使用口述证据的。在古代希腊,“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的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的真相”^①。这里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口述证据。实际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口述。例如:社会史广泛使用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的社会调查资料主要是来源于口述,其中有很多证据都是经过对目击者的访问而获得的。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方法,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

美国自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以来,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成立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口述历史项目。1966年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罗黑德湖举办了美国口述

^① [美] 里特尔编:《历史学概念辞典》,纽约,1986年版,第193页。

史学第一次大会；1967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至1967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余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对美国口述史学未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对每任总统卸任后进行访谈的资料整理完毕后，相应地设立总统图书馆。这一项目推动了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口述史学出现了“人民性”或“民主性”的倾向，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到1978年，口述史研究机构增加至500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普及，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等。1994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这个学会每年都有2500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研究^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20世纪在五六十年代就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实地调研，并撰写了一些调研报告^②。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注重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界也有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颇受学界好评，这套丛书有《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等。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90年代曾做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此外，近年来还有几本出版的口述史专著值得一提，如：定宜庄著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四卷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过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③。

近些年来，中国口述史学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大概是受几个因素影响：其一，受文学和社会学利用口述方法取得成就的影响；其二，扩大史料范围的需要，档案文献不再是唯一的史料；其三，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的需要，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兴趣的增长，把普通民众作为历史著作中的主角；其四，现代音响技术尤其是大量的廉价录音机的上市，是以现代电讯技术的发

① 杨祥银：《当代美国的口述史学》，《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透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中国口述史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还研究得不够，需要认真地总结。



展作为基础,犹如计量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并以它的推广作为其发展一样。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铺垫工作。

二、作为方法或学科的口述史

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实践和研究。

如果从中国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和西欧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撰写历史的时代算起,“口述”最初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来运用的。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口述”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一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地运用。既在历史学领域(包括社会史、政治史、婚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家庭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性史、娱乐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领域),也在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学和医学领域被运用。它基本上是用来进行资料和数据采集的方法,并以此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作为方法是最容易理解和认同的,这种认同是多学科之间的共识。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界所从事的口述史研究开始力图打破方法的界限,并要从学科的角度来认识和建设“口述史学”,这样就出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口述史”。这种口述史的最大特点是“拿来主义”,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把口述内容用文字反映出来,并把它冠名于口述史,这样做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上述我们提到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定宜庄著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等等,都有这类口述史学的特点。

问题进一步展开,就是有学者直接提出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提法是大胆的,对传统史学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我个人认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

把口述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首先要明确这个分支学科的界定和科学含义。它是否要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6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吻合。一般来说,相吻合比较合适,

遵守了国家的规定，具有规范性。按照《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现有学科门类12个，一级学科88个，二级学科381个。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含8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现有学科门类11个，下设71个二级类，249种专业。作为历史学下设5个专业，即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如果口述史是作为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8个二级学科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一旦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其他问题。因为口述史学很难有独特的只有自己研究而其他二级学科不去研究的内容，就是说口述史学研究的历史内容已经被很多二级学科涵盖了。如果口述史作为二级学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否考虑把它作为一个三级学科来看。而作为三级学科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首先，所谓三级学科只是一些学人的说法，在严格的学科分类上，并不存在什么三级学科，学人往往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课题愿意说成三级学科，这样的三级学科显然带有太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不科学性。如果把口述史硬性说成是三级学科，还要阐述三级学科的科学界定和三级学科的范畴或种类，这就更加困难，不是我们研究口述史的学人轻易就能完成的。如果口述史是作为历史学本科专业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5个专业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这样做同样面临着上述的困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不转换视角，不冲破固有的框架，硬要在原有的学科定位内挤出一块空间，确立一个新的学科，无论如何，难成大功。

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是对以往知识范畴和内容的总结和分析；学科分类是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知识的平台和基础，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也正是因为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所以学科分类也是有局限的，它需要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当然，这种修正和调整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探索知识的实践中，在有了相当的积累和丰厚之后，方能水到渠成。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交叉学科的不断形成，新的学科体系的诞生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实践、实践、再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深入认识口述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并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提升，这就可以为史学发展作出自身的重要贡献。从全国的角度看，目前我们应当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一个“十一五”的重点科研项目，或向教育部社科司申请一个“十一五”的重点科研项目。然后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共同从事并完成这一项目。项目的名称可定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此项目可以撰写3部专著，分别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学的



理论与实践》，每部著作20万~30万字。或只撰写一部专著，书名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本专著分为3编，上编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编为《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下编为《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共40万~50万字。通过这项课题认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欧亚和中国口述历史各自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重要特征、代表人物和著作、经验及问题等等。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它既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高校口述历史的教科书，为高校开设口述史学提供方便，并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着重讨论的几个问题

为了规范口述史的方法，严肃口述史的研究，在此还要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 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

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访谈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的印象鲜明。而口述历史虽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和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

2. 研究口述史应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学有所长。这不仅要求史学工作者有自己专长的二级学科专业，而且要求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这不是反对一个学者要有广博的学识，而是要求一个学者在科研工作中能真正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个人的生命经历决定他必须专攻一定的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在进行口述史的研究时，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要自己的特定领域。要在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内划出进行口述史的范围，这样做出来的口述史会有学术的品质，否则我们进行的所谓口述史，大概就是一般的访谈而已，绝不能冠以口述史的名义。因为口述史是史学研究，不通过研究就谈不上史学，自然也谈不上口述史学。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

特长划定自己研究口述史的领地，口述史学不是儿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更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有历史专业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可能胜任从事口述史学的工作，并作出自己的成绩来。

3. 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公之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从这些条件看，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优于中国近代史。当然，如果从更广的含义来理解“口述”，那么民间传说等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口述”，用它可以研究远时段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它比起近现代和现当代来说是不占优势的。若没有民间传说流传下来，也就只好运用其他的资料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了，从这一点看，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外，不同的领域对口述史来说，适用度也不同。如社会文化史或“人民史”更适合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比如英国的口述史就是主要应用于社会史领域，特别是在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史学工作者不能盲目轻易地转向口述史的研究中去。

4. 抓紧对新中国60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年了，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说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史研究的成果不可能是丰厚的；也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国史研究的领域也不能平衡地发展。在国史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条件可能更成熟些，所以应当着力并抓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婚姻家庭、两性伦理、娱乐消费、文艺体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这些社会文化史又特别适合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也比较充分。很多口述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可以弥补新中国60多年来的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报刊由停刊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困难。所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新中国60多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史学工作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口述史学，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迷惑和问题。首先是对口述史的认同问题。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的公认。迟至

1981年,英国著名的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在《历史学的性质》中说道:“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①在他罗列的史料类型中也没有提及口述史料。在目前的情况下,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以及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优缺点的讨论,尚未引起史学界更为普遍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交流方式包括文字交流和口述交流两种形式,其中“口述”资料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之一。其次是回忆的可信度问题。被访者回忆过去的经历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其经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局限性的。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被访者记忆的误差以及在表达过程中刻意的修饰、夸张和自我拔高以及回避、掩饰和难言之隐,都在所难免。受后来经历的影响,也可能造成“过去的声音”成了“现在的声音”等等。最后,采访者理解上的误差,采访者学识的深厚程度、理论水平和判断能力,对采访内容的熟知程度,这些都影响采访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误差程度。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要通过我们的实践和努力逐步克服。我们坚信,中国的口述史学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领域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

^① [英] 马威克:《历史学的性质》,伦敦,1981年版,第141页。



前言

本书虽然被命名为“访谈录”，当然也有原始录音作为佐证，但与其他访谈还是略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同“陌生人”对话，即除了受访者自愿提供外，笔者没有主动问及其姓名并对一些可辨认的信息进行了处理。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笔者更侧重于寻找答案和解决问题。我的访谈原则是只要符合“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等关键字即可进行访谈。而一些无关的信息可剔除。以姓名为例，它只是个代号，或许有的名字能反映出时代的烙印，但与我的研究题目——《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在访谈中我没有刻意留意。

其次，虽然本访谈录是在受访者口头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为了保护其隐私，或者免于给其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笔者对有关地名或其他可辨认的信息进行了处理。以这种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权益。这也是访谈中“匿名”原则在研究伦理中的充分体现。

第三，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对话，一方面可防止熟人之间极力回避某些隐私或敏感性话题的弊端，另一方面可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采访者而言，通过熟人介绍联系采访对象固然是好事，但这种方式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如某人曾是位工人，他可能会帮采访者介绍一大批同行，而从事其他行业者，诸如干部、农民的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这些人彼此间都非常熟悉，访谈中可能会极力回避一些隐私性话题，不利于采访者收集信息。以笔者的研究题目——《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研究》为例，这项研究需要了解当时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婚姻状况。单靠亲朋介绍这种“滚雪球”式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笔者利用“天时”、“地利”等因素，于2010年5月~8月间到学校操场、公园、小区接触到近百位老人，获得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本文试对访谈录的形成谈一些实践体会，尚乞识者不吝指正。

一、访谈前的准备

首先是时间的选择。北京的天气在5月以后逐渐变暖，在屋子里待了一冬的老人，大都会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这一时期也正是进行访谈的最佳

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

第三辑

时机。从2010年5月份起，我在校园操场、公园进行了近一周的观察，发现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一个人或者由老伴陪着一起散步，时间一般是早上六七点钟和晚上七八点钟。边散步边聊天，给我的采访提供了良机。

其次是地点的选择。如在操场或公园，一般应在入口处等待。这样可以观察到谁是刚刚到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交流。以免访问刚刚开始或进行了一半，受访者已锻炼完毕起身告辞，使访谈不得不中断。另一方面，这些人大部分在活动地点附近居住，便于进行二次访谈。所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是顺利进行访谈的必要条件。

二、访谈进行中

良好的采访环境是访谈成功的基础，而如何顺利访问才是根本。我谈谈自己的实践体会。

1. 访谈的切入

短时间内切入主题是访谈进行的第一步，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步。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访谈对象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有的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又经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种种经历。长期的政治斗争和运动，使他们形成了沉默不语“不乱讲话”的惯性。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 斯蒂文（Bruce M. Stave）所说，“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学的状况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像北京城的建筑一样，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墙后面。”^① 切入方式不当，往往会遭到受访者的拒绝。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几点特别重要。

首先，要有谦卑的态度。访谈中，主体已不再只是采访者，而且还应该包括受访者。要让受访者明白你是在向他请教或探讨某个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一问一答式对话。如“我可以向您请教个问题吗？”和“我可以采访您吗？”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得到的效果也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主体间性”^② 模式，而后者为一种“主客体”模式，容易给人一种主体单方面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种种生活磨砺的老年人来说，更乐意听到前一种提问方式，因为这是“一种让口述者感觉到舒服而不被束缚、感觉到被尊重而不是被摆布、感觉到他是口述历史的主人而不是被讯问的对象。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之中，口述者才有可能自愿地、主动地将最隐秘的那道记忆

① [美] 布鲁斯·M. 斯蒂文：《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闸门开启。”^①在遇到不懂的问题时，采访者不要不懂装懂，即使知道一点也不要信口开河，应在虚心请教的同时与受访者形成共鸣。当然这不是要采访者“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而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

其次，要让受访者放松警惕。采访者如果是学生，在说明访谈目的的同时，不妨利用胸卡、暖壶、学生装等一些易识别的标识性物件证明身份，让受访者明白你是想搞科研而请教。

第三，征得受访者同意后，第一个问题一定要便于和易于受访者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不一样，过于“书面化”的提问方式，有的人不一定能够听懂。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可以向受访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能告诉我您结婚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吗？”即使受访者已经忘记，但大都会说“我们那会儿特简单。”然后会具体地讲到当时吃、穿、用“简单”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再因势利导，得到采访者想要知道的信息。

最后，避免刚切入主题就打听别人“隐私”，如您出生于哪一年？哪一年结婚的？您爱人做什么工作？您有几个孩子等？这样容易引起受访者的反感。他们很可能把这种方式看成是早年“搞运动”时的调查。最好在访谈刚刚开始时，让受访者谈谈他对当时婚姻的基本看法。然后再根据情况，选适当时机让其谈自我婚姻感受。

2. 访谈进行中

第一，学会因势利导。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不同的人都会根据自身的不同体验来建立一套内在的道德认同和叙事逻辑。有的人可能会大谈特谈其个人的“辉煌历程”，有的人可能会讲到一些触及内心的深层伤害。不管是哪一种，采访者一定要认真听，表明你很尊重他的看法，或者对其遭遇表示同情，然后再寻找时机转移话题。如有一位受访者讲到“三年自然灾害”时，谈了许多与主题相去甚远的话题。我插问一句“您家里有人浮肿吗？”受访者被引回主题，说：“我们家五口人，我和三个孩子都没浮肿，就她（指着妻子）浮肿了。”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得到三个信息：他们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妻子当时为全家作出牺牲。接着这个话题，还可以问：“当时孩子们都多大？”如果知道他们结婚时间，再根据孩子年龄，就可以推算出他们是在结婚几年以后要的孩子？从而得知他们的家庭生育情况。

第二，注意力高度集中，随时记住一些侧面信息。

受访者情况不同，访谈时间也有长有短。以我的采访提纲为例，一个较为完善的访谈需要近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受访者在谈到某个问题的同时也

^① 王海晨，杜国庆：《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回答了采访提纲上所列的其他问题，而采访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内很容易忽视某个信息，而重新提出类似的问题，容易影响受访者的情绪。加之婚姻问题涉及个人隐私，如果“刨根问底”，很容易使受访者反感，甚至以为采访者有什么不良动机。所以访谈过程中需要采访者保持相当高的敏感度和觉察能力，在集中注意力的同时随时记住受访者提供的一些侧面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得到所需信息，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受访者的警惕与戒备心理。下面是一位受访者的叙述：

我1951年结婚。大概23岁上大学，南昌大学机械专业。解放前在上海工作，解放后在太原重机厂，1955年来北京在设计院工作。工作了六七年才结婚。

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受访者的基本情况：1945（4）年大学毕业（1951—6（7）），1941（0）年上大学（1945（4）—4），出生于1918（7）年（1941（0）—23），在上海工作了5（1949～1945）年，在太原工作了6（1949～1955）年，而且受访者是在太原工作期间结婚的。

第三，适度调节提问方式。

“口述史的叙述方式带有相当的主观性特征，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叙说和分析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① 一问一答式的访谈，获取的答案集中，捕捉的信息快捷，但不容易表达出受访者的心声。让访谈人随意发挥式的访问，可以捕捉到很多信息，但答案不集中。

由于受访者受性格、信仰、民族、学历、文化背景、在场人数、与采访者之间的关系、与采访者年龄差距、性别差异等方面的影响，到底是采取一问一答式还是给受访者足够的自由度？我认为不在于事先准备好什么样的提问方式，而在于对不同的受访者，对不同的问题适时作出调整。以我的研究对象为例，提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引导受访者的前提下，让其随意发挥；二是一问一答式的对话方式。对于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受访者而言，他们不可能全面而又具体地概括某个问题，需要用一问一答式的对话来完成访谈。而对于高学历的受访者而言，他们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在采访中应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其畅所欲言。

同时采访几个人，这种集体记忆的方式容易激活每个受访者的记忆细胞，能防止许多易被遗漏的信息。但婚姻问题涉及个人隐私、个人情感和生活感受。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轻易在大庭广众下尤其是在熟人之间暴露隐私的，特别是负面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采访者对所设置的问题作出调整，使之与当时社会联系很紧密但又不至于令人难以启齿。例如我在同时采访三位老太太时，她们谈的更多的是嫁妆的准备、婚礼举办的隆重与否等。当两位

^①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老太太离开后，剩下一位老太太开始诉说她与丈夫如何感情破裂，为何直到现在仍然和丈夫分居而不离婚。

对于那些实在是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不妨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得信息。如谈婚姻肯定离不开“性”。但在我们国家由于年龄差距、传统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不要说与老年人谈论性，就是与青年人和中年人谈论之，也都会被认为是一件极其羞耻事情。为了避免尴尬，不妨把这类问题设成问卷形式让受访者单独完成。

第四，婚姻文化是社会文化史^①的一部分。访谈中要紧紧把握住时空维度。

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虽然是1949~1966短短17年的历史，但在这一阶段，国家的政策多有变动，导致婚姻政策和人们的婚姻观念也有所变化。而在访谈中，受访者很容易把其人生经历中最为深刻的某件事说出来，以偏概全，容易给采访者造成一种模糊印象。如我问到一位86岁的老人，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有两三个老婆的家庭如何处置时，受访者回答：“先动员你（离婚），动员不动就强迫你离。可以跟你协商，你要哪一个？剩下的该改嫁就改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对过去的重婚纳妾问题的处理是：如果女方提出离婚，一般判决离异，但是不允许双方提出复婚的要求。如果妻妾都没有提出离婚的要求，或者说都不愿意离婚，那么在户口簿中登记的一方为男方的合法妻子，其他人仍然住在男方家里“和平共处”。这是大变迁时代过渡的一种婚姻形式。所以我们不仅要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加以识别，而且在采访过程中最好问清楚事情发生在什么时期。

由于时隔久远，老人需要长时间回忆。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耐心等待，而且还要适当启发。比如有的人连哪一年结婚都忘记了，采访者可以从几个大事件来引导。如“‘文革’前还是后？”“‘三年困难时期’前还是后？”“‘大跃进’前还是后？”“‘反右’前还是后？”掌握个“概数”。

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解放初期北京市的人员流动变化较大，来自不同地区（见下表）的夫妻，其婚姻观和婚姻状况也有所不同。来自老解放区的人，其婚姻更为自主独立。如一位受访者说：“我从小就离开了家了，一切主张都在我自己。”而北京本地人的婚姻观却是在逐步变化的，有一个螺旋式的渐变过程。夫妻双方都来自外地与一方或双方来自北京地区的夫妻相比，前者的婚后生活更为艰辛。如家务活重、孩子无人照顾等。

^① “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夫	北京市区	北京市区	老解放区	老解放区	北京市区	老解放区	其他地区	北京市区	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
妻	北京市区	北京郊区	老解放区	北京市区	老解放区	其他地区	老解放区	其他地区	北京市区	其他地区

另外，职业和学历不同，夫妻的婚姻状况和家庭生活也往往不同。如知识分子的家庭更为民主，孩子相对较少。而夫妻双方特别是丈夫为工人或农民的家庭，孩子相对较多，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为繁重，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也相对严重。

三、访谈资料的完善及访谈功用

访谈资料不可能做得一步到位，需要在不断访问和查阅文献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在访谈中，我们在证实某个事实的同时，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不妨把这种“惊喜”列入访谈提纲，用于以后的访谈中，进而找到规律、得出结论。还有，我们在翻阅文献时，也会发现好多困惑，除了找官方文件来了解外，还可以把它列入采访提纲中，找受访者来“答疑解惑”。

关于访谈的功用，学者们已经谈过很多，相同的观点我不再赘述。仅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采访记录的史料价值往往大于采访者本人所利用的价值。它不仅是历史资料，而且由于它鲜活、生动、具体、贴近生活、靠拢现实的特征，还可为编剧、文学家提供更多的细节，使其文本构造得活灵活现，艺术表现得更加完美，思想表达得更为深刻但又不影响真实性，容易被大众接受。“正如同我们熟悉地上的林木，却很少知道深埋在地下的根须。口述史为我们暴露了历史事件的‘根须’和‘细节’，从此我们能够认识作为一棵完整植株的全部。”^①

其次，在研究社会文化史方面，特别是涉及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和个人感情等个性化东西，访谈资料有着文字资料所不及的功用。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恋爱、婚姻、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都用政治标准加以衡量，私事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公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家庭妇女在各种报告中检举丈夫或动员丈夫坦白，很多妻子与

^① 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



丈夫划清界限。这种行为不仅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还受到政府的保障和舆论的鼓励。子女在这种“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成长，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政治意识”。导致“文革”爆发后极度夸张的家庭伦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代传统“孝亲”思想，“斗私批修”的利剑直指“子为父隐”、“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意识。^①“阶级”、“派性”等政治观点渗入到家庭内部，国家意志成为中国人精神意识的新主人。要了解这一时期年轻人如何相遇和求爱？他们如何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工作、家庭感觉如何？作为孩子或是作为父母是什么感受？阶级意识在不同职位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似乎没有一个是能够凭借常规的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来回答的。真实的细节只有在访谈中才能得以丰富和立体化。

第三，和老年人交往，采访者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被采访者跌宕起伏的经历使他们更为迂阔、豁达，对人性、人情与人生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每次长谈，我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们总能从不利中发现有利因素，从危机中发现潜藏的契机，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在彷徨中看到曙光。还有，“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研究心得，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可以通过口述方式嘉惠后学。”^② 他们的督促会让我们心情开阔，会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如果能把他们生命流动的过程和价值观念的重建上升到理论层次，然后再回归到人的经验的探索过程之中，不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吗？

四、其他细节

唐纳德·里奇说，“与记忆力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事”^③，在与受访者交流过程中，稍有不慎，记忆的闸门很快就会关闭，而且很难再次开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绝不是耸人听闻的谎言。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教训，总结出以下几点，希望把它作为后车之鉴。

第一，我的采访环境一般是露天，难免会出现嘈杂的情况（如汽车声音），为了避免后期整理时的困难，采访者可以大声重复一遍受访者的答案，一方面作为对受访者的回应，另一方面便于日后整理。有些人是从外地来京，使用的是方言，对于听不清楚的地方，采访者一定要虚心请教，以防在整理过程中漏掉一些关键信息。另外，在整理访谈记录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些软件进行消除噪音的处理，以改善播放效果。如 Adobe Audition、Gold Wave、NGWave Audio Editor、AllEditor 等专业的音频编辑软件都具有消除噪音的功能。

① 梁景和，王宇英：《“文革”时期家庭问题研究论纲》，《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张宜：《中国当代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外语学刊》，2008年第6期。

③ [美]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